



北港朝天宮「與天同功」匾考： 兼論北臺客家文物

謝名恒*、羅烈師**

摘要

本研究討論北港朝天宮「與天同功」匾額之來歷。依目前朝天宮廟內文獻，本匾係清光緒皇帝所頒贈，唯李建緯考察全臺灣「與天同功」匾額所完成之研究成果，北港朝天宮內未見有此匾額。本研究首先查證既有文獻記載「與天同功」匾額之內容，釐清此匾的文字與影像紀錄，同時利用關鍵史料《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證明「與天同功」匾額並非清代光緒皇帝所贈與，而是日治時期新竹州新埔街眾信所捐獻。本論文之貢獻不僅是釐清朝天宮文物之身世而已，更重要的是發現客家庄新埔街與北港朝天宮長期且深厚的分香廟及其祖廟關係；同時，更拈出未來以此個案討論光緒皇帝贈匾與臺灣媽祖信仰擴張之關聯。此外，本文兼論該簿所記載北港朝天宮內存北臺灣客家文物現況，提出後續客庄媽祖研究的拓展可能性。

關鍵字：北港朝天宮、新埔與天宮、與天同功、客家文物、媽祖信仰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博士候選人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A Study of the Plaque “Yu Tian Tong Gong (與天同功)” at Beigang Chaotian Temple: With a Discussion of Hakka Cultural Relics in Northern Taiwan

Ming-Heng Hsieh* , Lieh-Shih Lo**

Abstract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provenance of the Yu Tian Tong Gong (與天同功) plaque at Beigang Chaotian Temple, traditionally believed to have been bestowed by the Guangxu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of textual and visual records, combined with analysis of the *Detailed Inventory of The Halls of Beigang Chaotian Temple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Shōwa Era*,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plaque was not an imperial gift but was donated by believers from Xinpu Street in Hsinchu Prefec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eyond clarifying the artifacts origin, the paper reveals a long-standing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kka community of Xinpu and Beigang Chaotian Temple as a branchmother temple network. This case also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 plaque narratives and the regional expansion of Mazu worship in Taiwan.

Keywords: Beigang Chaotian Temple, Xinpu Yutian Temple, Yu Tian Tong Gong (與天同功)”, Hakka cultural relics, Mazu belief

*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一、前言

根據李建緯考察全臺灣媽祖廟內的「與天同功」匾額之研究（李建緯 2013、2014、2018），¹發現文獻記載中有 23 面，其經過田野調查又再發現 3 面，總計全臺共有 26 面「與天同功」匾額（李建緯 2013：318-330；2014：124-129），為清代皇帝贈匾中最多的一塊。該文以媽祖廟現存「御匾」為研究核心，探討臺灣媽祖廟內由清帝頒贈匾額所帶來的政治神話與集體記憶。御匾不僅是皇帝或官員所賜的物質文物，更是凝聚社群記憶與信仰正統性的表徵。李建緯指出御匾是種集體記憶的歷史文本，更是代表集體性的政治認同與象徵符號，御匾的視覺化、具體化與客體化，讓信徒透過匾額接觸到媽祖靈驗的神話，並在不同時代中重新賦予意涵。廟方藉由再製或仿製的御匾，刻意營造靈驗故事、形塑群體認同，正是屬於「建構出來的集體記憶」。

不過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李建緯文中表示「經實地勘查，在上述二十六面匾額中，新竹內天后宮、新竹長和宮、苗栗苑裡慈和宮該匾已遺失，雲林北港朝天宮則實際未見」（李建緯 2013：318；2014：124，底線為筆者所加）。其文中表二：臺灣媽祖廟所見「與天同功」匾額之地點與相關資料中，「璽印、上款、下款、工藝特點」皆為「不詳」。文中僅說明《臺灣名勝舊蹟誌》（杉山靖憲 1916）、《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鄭喜夫、莊世宗 1988）兩書有紀錄此匾，卻未收錄於宮志中，實際考察未見（李建緯 2014：128）。需要注意之處，李建緯在專書《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中第五章〈臺灣媽祖廟現存「御匾」研究：兼論其所反映的集體記憶與政治神話〉（李建緯 2018：236、238）文中將「雲林北港朝天宮則實際未見」此句話刪除。同時表 5-2：臺灣媽祖廟「與天同功」匾額地點與相關資料，將北港朝天宮欄目改為「璽印：無；上款：無；下款：無；工藝特點：龍紋框，疑似整料；收錄資料：《臺灣名勝舊蹟誌》、《光復以前臺

1 據查李建緯原先於 2013 年發表〈臺灣媽祖廟所見「與天同功」匾形式與工藝研究〉，頁 309-335，收錄於葉樹嫻總編輯，《2013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隔年（2014）另增補改寫為〈臺灣媽祖廟現存「御匾」研究：兼論其所反映的集體記憶與政治神話〉，發表於《民俗曲藝》186：103-179；最後 2018 年收錄於專書《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第二部分 文物的記憶與認同」第五章〈臺灣媽祖廟現存「御匾」研究：兼論其所反映的集體記憶與政治神話〉。

灣匾額輯錄》；備考：尚存」。由此看來，或許李建緯最初調查因某種原因而未見「與天同功」匾額，隨後卻於專書內文則調整說法，確認有此一匾額，但對於其來源、年代、形制與工藝無法判斷，故持有保留態度。

然而筆者前往北港朝天宮實際調查，經詢問北港朝天宮文物館邱彥翔研究員，確定「與天同功」匾額現今懸掛於聖母殿龍邊過道上方橫樑。並且請教宮內資深廟務人員祭祀組紀仁智組長，亦表示宮內僅有此塊「與天同功」，並未有額外之匾額。²那麼這塊「與天同功」匾額來歷為何？本文企圖論證李建緯（2013、2014、2018）的研究中，在北港朝天宮所未見之光緒御匾的身世之謎。本研究首先查證既有文獻記載「與天同功」匾額之內容，釐清此匾的文字與影像紀錄，同時利用關鍵史料《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證明「與天同功」匾額並非清代光緒皇帝所贈與，其實是日治時期新埔街信眾所捐獻。此外，本文兼論該簿中記載及北港朝天宮內存之北臺灣客家文物現況，提出後續客庄媽祖研究的拓展可能性。

筆者另著有〈北港朝天宮現存北臺灣客庄文物及史料概述〉一文（謝名恒、羅烈師、邱彥翔 2025）。該文彙整朝天宮內現存的北臺灣客庄文物與史料，搭配圖片展示與文字說明，初步勾勒北港朝天宮與北部客庄的關係。文中以「類型」為區分，說明文物（捐獻木匾、對聯、牆柱、香爐、神桌與進香旗等）；史料（領收原符、進香紀錄簿等）之種類、形制與現況。根據研究發現，朝天宮內文物與北臺灣客庄有高度關聯的有，重修捐獻芳名木匾（1908-1912）「大溪呂鷹揚、北埔姜義豐、苗栗黃南球」；捐獻對聯「北埔姜義豐、新埔大茅埔」；捐獻門柱「大溪呂鷹揚、龍潭三坑仔、關西咸菜厝」；望燎爐座與文昌殿頂桌「龍潭三坑仔」；薦盒架「湖口波羅汶中崙」、大殿案桌「橫山沙坑」，以及進香旗「近半數為客庄」。史料中進香紀錄簿所記載呈現北臺灣客家庄的特殊進香模式「時間規律模式及其空間區域分佈」；領收原符中的客家地區多以聯庄形式進香，如「中壢、新埔、北埔、沙坑、銅鑼」等等北臺灣客家庄。本文即是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之上，嘗試進一步深化北港朝天宮與北臺客家媽祖信仰之關聯性。

2 承蒙北港朝天宮祭祀組紀仁智組長與文物館研究員邱彥翔的受訪與指點，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圖 1 《北港朝天宮志》（蔡相輝 1995：211-2）「與天同功」匾額紀錄。（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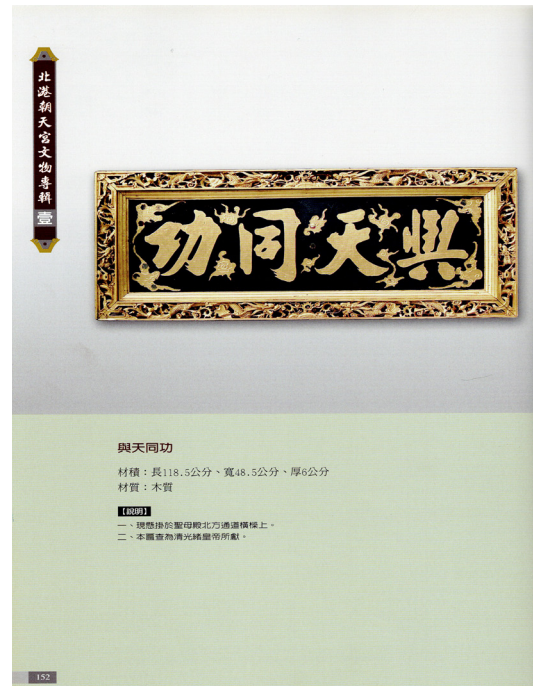


圖 2 《北港朝天宮：文物專輯壹》（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 2010：152）「與天同功」匾額紀錄。（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二、北港朝天宮「與天同功」匾額之紀錄

首先查閱《北港朝天宮簡介》（朝天宮管理委員會 1967：22-23）的第十章〈名人的題詠〉第二節匾文中沒有提到「與天同功」這塊匾額。³ 接著檢索《北港朝天宮志》（廖漢臣審訂 1968：65-71）第五篇〈文物〉第三節匾文也未見「與天同功」之紀錄，此版宮志詳細盤整當時朝天宮各殿內的匾額共 33 塊，清楚註有捐贈的來源與時間。再次翻閱《北港朝天宮志》（蔡相輝 1995：203-211）一書中第四篇第一節關於文物一匾額的紀錄發現，書中未記載「與天同功」匾額之文字內容。然而文後圖錄內卻有拍攝匾額實體影像（蔡相輝 1995：211-2，參見圖 1），而且此版《北港朝天宮志》將其稱為「清光緒皇帝匾」。

3 文中列出匾額如下：「神昭海表」（雍正皇帝）、「慈雲灑潤」（光緒皇帝）、「海天靈既」（王得祿）、「享于克誠」（佐久間左馬太）、「神恩浩蕩」（石塚英藏）、「福翰慈航」（堀田鼎）、「光澤四海」（周至柔）、「厚德歸民」（陳大慶）。



圖3 北港朝天宮廟內現存「與天同功」匾額。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4 北港朝天宮廟內現存「與天同功」匾額掛置處。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進而查詢《北港朝天宮：文物專輯壹》（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 2010：152）一書，卻已明確記載「與天同功」為木質匾額，是一塊黑底塗以金漆字體，字體之間鑲有蝙蝠紋飾，外框則飾以金漆龍紋樣式。書中註記尺寸「長 118.5 公分、寬 48.5 公分、厚 6 公分」，下註說明有兩點，一是「現懸掛於聖母殿北方通道橫樑上」，二是「本匾查為清光緒皇帝所獻」（參見圖 2）。根據本文實地調查，此匾額目前懸掛於宮內聖母殿龍邊過道上方橫樑，由於北港朝天宮來往信眾絡繹不絕且連年香火鼎盛，在長期煙燻之下已呈全黑（參見圖 3）。經過初步觀察可見本塊「與天同功」匾額並未有上下落款字樣或刻有印璽圖章，同時尺寸規格明顯小於清代御賜匾額（參見圖 4）。

由此可見，關於李建緯所提「未收錄於宮志中，實際考察未見」，本文初步推斷兩種可能性。一是北港朝天宮初期編輯宮志時疏漏，未將「與天同功」記載於文字紀錄內，所以李建緯表示未收錄。尤其邱彥翔研究員提醒，北港朝天宮於民國 52 年起（1963）至民國 61 年間（1972）曾經進行大殿整建增高工程，當時有將殿內多數重要神像、構件、文物、器具等收於庫房中存放。⁴或許正因如此，初期所編輯《北港朝天宮簡介》（朝天宮管理委員會 1967）與《北港朝天宮志》（廖漢臣審訂 1968）二書時，因整建工程影響而未見到「與天同功」匾額。

4 《北港朝天宮建築與裝飾藝術》（李乾朗 1993：48）一書提及：「1963 年改建正殿落成，拆去木構造，改為水泥構造之樓閣式大殿，由出身澎湖的匠師謝自南主持設計。1964 年重作前殿及正殿前軒之屋頂剪粘，由來自彰化永靖的名匠江清露負責……另外，1972 年又在左右護室之上改建為水泥構造鼓樓，採重簷樓閣式，對朝天宮益增壯觀。」



二是李建緯雖然知道有此塊匾額，但是無法明確釐清捐贈單位及獲贈時期，推測並非光緒皇帝所贈之御匾，因此強調考察未見。實際上，經本文查證出早期《北港朝天宮簡介》（朝天宮管理委員會 1967）與《北港朝天宮志》（廖漢臣審訂 1968）兩本宮志未有記載「與天同功」，可能是因為大殿施工將匾額收存未見。然而後期出版《北港朝天宮志》（蔡相輝 1995）、《北港朝天宮：文物專輯壹》（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 2010），已有明確拍攝「與天同功」匾額之圖像。簡言之，就「與天同功」匾來說，北港朝天宮認為這塊為光緒御匾，而李建緯無法斷定而有所保留。

不過根據《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鄭喜夫、莊世宗 1988：526）書中之記載原文如下：

〔璽〕與天同功

按：存雲林縣北港鎮朝天宮。錄自臺灣名勝舊蹟誌。此匾未見於北港朝天宮志。匾正中上方璽文：「光緒御筆之寶」。

從上述引文可以得知兩項資訊，一是由鄭喜夫、莊世宗所編輯之《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1988）此書未有實地前往朝天宮內調查，而是轉錄《臺灣名勝舊蹟誌》（杉山靖憲 1916）內文，且未留有匾額的影像紀錄。二為書中描述這塊「與天同功」匾額正上方具有光緒御筆之寶，而現存北港朝天宮內「與天同功」匾額卻未能見此御印。然而進一步翻閱《臺灣名勝舊蹟誌》（杉山靖憲 1916：324-325）該書對於當時北港朝天宮內的匾額描述原文如下：

「神照海表」上方中央に（道光御筆之寶）の璽わり⁵

「慈雲灑潤」上方中央に（光緒御筆之寶）の璽わり

「與天同功」「四海永清」「寰中慈母」

從此引述便可清楚得知，杉山靖憲前往北港朝天宮調查時，其所看到的匾額僅有「與天同功」四字，並未註明光緒御筆之寶的御印，也未有拍攝照片。根據原書的撰寫體例來看，明確紀錄「神昭海表」與「慈雲灑潤」兩塊御匾，有註明

5 應是「神昭海表」，日文譯文為「上方中央刻有「道光御筆之寶」的璽章」。

御筆之寶的璽印；然而「與天同功」並未註記，因此推斷並非御匾。至於《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一書為何會將北港朝天宮內的「與天同功」寫作御匾，筆者查閱該書錄有「與天同功」共 20 塊匾額中，有 17 塊皆有註記匾正中上方璽文：「光緒御筆之寶」（鄭喜夫、莊世宗 1988：523-529）。該書描述如此一致的排版格式，加上未有前往實地考察佐證，本文認為應是誤植內文，進而誤認御匾。

本文由此推斷，日人杉山靖憲撰寫《臺灣名勝舊蹟誌》（1916）時，確實有見到「與天同功」匾，而且是未刻有御璽的版本，筆者判斷即是現存北港朝天宮之匾額。至於鄭喜夫、莊世宗《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1988）並未到現地調查，僅是轉寫抄錄而未查證，故將北港朝天宮內「與天同功」匾額，假定與其餘臺灣媽祖廟內的「光緒御匾」形制、規格、內容一致，便註明此匾未見於北港朝天宮志。綜上討論，條述如下：

其一，《臺灣名勝舊蹟誌》（杉山靖憲 1916）錄有「與天同功」匾額（未刻有御璽）；其二，《北港朝天宮簡介》（朝天宮管理委員會 1967）及《北港朝天宮志》（廖漢臣審訂 1968）皆未收錄「與天同功」匾額（可能受到改建工程影響）；其三，《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鄭喜夫、莊世宗 1988）轉錄日人著作，誤植北港朝天宮「與天同功」為御匾，並且註記《北港朝天宮志》（廖漢臣審訂 1968）未有收錄；其四，《北港朝天宮志》（蔡相輝 1995）與《北港朝天宮：文物專輯壹》（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 2010）兩書皆附有「與天同功」匾額影像，並且持續受到《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鄭喜夫、莊世宗 1988）一書誤導為御匾。

換言之，北港朝天宮有「與天同功」匾，但非御匾。尙值一提者，比較近代兩本朝天宮志（蔡相輝 1995：211-2；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 2010：152）中影像與目前廟中燻黑匾額的樣式，二者幾乎雷同（參見圖 5、6）。只是上述二書中這塊匾額的精緻度且光澤度較高，暫時無法排除有修復或再製的可能性，相當值得未來進一步檢測與研究。⁶

雖然目前未將本塊匾額取下進行科學分析（木質品種、銜接方式、製作工序），但是仔細觀察「與天同功」匾額字體中的工藝，如字形樣式（「與」、「天」

6 承蒙審查委員提醒，近年臺灣寺廟常有舊匾重製的現象，如臺中早溪樂成宮「法雨如來」匾。



字的點捺寫法)、書法筆觸(「同」、「功」字的破鋒之處)及視覺布局(「天」、「功」字的傾斜角度)等,⁷皆與全臺灣現存之「與天同功」匾額有顯著差異。因此本匾額很可能既非御匾,亦非清代所製。⁸此外,相較於朝天宮聖母殿正上方的「神昭海表」匾額,中間刻有「御筆」二字,明顯不同;同時「與天同功」匾在尺寸上也明顯小於「神昭海表」匾,可見將「與天同功」視為御匾,並不正確。

若是進一步比較北港朝天宮內於日本時代所捐贈的匾額(參見表1),可以發現「與天同功」匾額尺寸依然相對較小;不過日本時代所贈匾額材質皆為木製,也都是以黑底塗以金漆字體,採用金色龍紋外框式樣,整體形制算是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北港朝天宮的聖父母殿於1995年發生火災,「享于克誠」、「光輝」、「神恩浩蕩」三塊匾額慘遭燒毀。⁹所幸廟方當時已將廟內所有匾額進行拍攝與拓印,災後另外重製,再次掛回樑上。不過「與天同功」匾掛置於聖母殿,並無經歷過祝融之災,但不



圖5 北港朝天宮廟內現存「與天同功」匾額紅外線左半部。(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提供)



圖6 北港朝天宮廟內現存「與天同功」匾額紅外線右半部。(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提供)

7 詳見李建緯,2014,〈臺灣媽祖廟現存「御匾」研究:兼論其所反映的集體記憶與政治神話〉。《民俗曲藝》186:103-179。頁157-165。

8 在李建緯的研究中,將臺灣媽祖廟所見「與天同功」匾分成以下幾種:(一)具清代御賜匾額特徵者、(二)具清代特徵然非御賜匾額者、(三)字體與御匾相似或現代重修之匾、(四)字體風格異於御匾、工藝亦未具清代特徵者。同上註,頁130-136。

9 根據北港朝天宮文物館研究員邱彥翔訪談得知。

排除現存這塊「與天同功」匾也具有類似上述三匾之再製或修復情況，值得後續進行科學檢驗方能確認。

表 1 北港朝天宮內日本時代捐獻匾額一覽

名稱	時間	落款	尺寸	形制	備註
與天同功	推估大正元年（1912）至大正5年（1916）左右	無	長 118.5 公分、寬 48.5 公分、厚 6 公分	木質，黑底塗以金漆字體，字體之間鑲有蝙蝠紋飾，金漆龍紋外框	現懸掛於聖母殿龍邊過道上方橫樑，本文考證為新埔街信眾所贈
享于克誠	大正 2 年（1913）3 月	臺灣總督陸軍大將正二位勳一等伯爵佐久間左馬太印印	長 199.5 公分、寬 69.5 公分、厚 5.5 公分	木質，綠底塗以金漆字體，金漆龍紋外框	現懸掛於開山廳門楣上，1995 年聖父母殿火災後重製
光輝	昭和 3 年（1928）	藤雨田印印	長 174 公分、寬 87 公分、厚 4.5 公分	木質，木底塗以黑漆字體，金漆龍紋外框	1995 年聖父母殿火災後燒毀，並未重製
神恩浩蕩	推估昭和 4 年（1929）至昭和 6 年（1931）	石塚英藏印印	長 170 公分、寬 86 公分、厚 5 公分	木質，黑底塗以金漆字體，金漆龍紋外框	現懸掛於聖父母殿橫樑上，1995 年聖父母殿火災後重製
福輪慈航	昭和 10 年（1935）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總長堀田鼎印印	長 243 公分、寬 88 公分、厚 5 公分	木質，黑底塗以金漆字體，金漆龍紋外框	原懸掛於福德正神殿橫樑上，現收存於庫房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北港朝天宮志》（蔡相輝1995：211-3-6）、《北港朝天宮：文物專輯壹》（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2010：164-167）。

三、《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與北臺灣客家文物

（一）簿中記載之「與天同功」

有鑑於此，若現存於北港朝天宮之「與天同功」匾額並非清光緒皇帝所頒贈，那麼這塊匾額的來歷為何？本文藉由一份新發現的關鍵史料紀錄，以重新佐證「與天同功」乃日治時期製作之可信度。根據《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



（參見圖 7）內文所見，簿中記載「品目：匾額；數量：一；摘要：與天同功 新埔街衆信」此條目。由此可證實廟內現存「與天同功」匾，應該就是「新埔街衆信」所獻，且其贈匾年代至少不晚於昭和 6 年（1931）。目前為止，我們已無從得知切確的捐贈年代，不過依北港朝天宮「領收原符」等檔案資料，新埔鄉紳係於 1911 年帶著進香旗來北港請示媽祖，後於 1914 年由地方信衆捐獻建廟。¹⁰ 因此，新埔信衆獻匾的年份應該是明治 44 年（1911）至昭和 6 年（1931）之間。

至於新埔街信衆為何會製作匾額贈與北港朝天宮，本文推斷與明治 41 年（1908）至大正元年（1912）的北港朝天宮重建有高度關聯。¹¹ 此次修建主要因為歷經光緒 20 年（1894）10 月北港街內失火多日，焚毀衆多街屋民宅，並且燒毀朝天宮前殿。隔年（1895）又因日軍來臺未有機會整修，加上明治 38 年（1905）嘉義大地震，使得大殿受到毀損，北港地方仕紳藉此倡議改建。本次由區長蔡然標帶領，交由陳應彬大木匠師主持，施工期間為明治 41 年（1908）8 月 26 日至大正元年（1912）1 月。並且號招全臺募款重建，總共募集 79,000 餘元，捐款人數高達 30,000 人，目前由北港朝天宮文物館保存共有十塊「建築朝天宮募集寄付金芳名」木匾。而來自桃園廳與新竹廳之捐獻超過 5,000 多筆，顯示出日治初期北臺灣客家地區便與北港朝天宮有密切往來的互動關係。¹² 正因如此，當時處於蓬勃發展的新埔街信衆更是不斷藉由北港進香、迎回媽祖、捐獻重建等方式，開展與朝天宮的跨區交陪，為後續興建「新埔與天宮」立下穩固的信仰基礎。

倘若試圖考證現存於北港朝天宮「與天同功」匾的可能製作年代，則有以下三種時序之推斷：一是先製匾額贈朝天宮，後建與天宮（1914 年前製匾）；二為先建與天宮，再製匾額贈朝天宮（1914 年後製匾）；三則是匾額與廟宇同時完成，

10 關於新埔與天宮的創建考證，可詳見羅烈師、謝名恆、王鈺涵，2025，〈新埔與天宮媽祖信仰之形成〉。論文發表於「2025 第三屆全球客家研究聯盟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新竹縣竹北市：全球客家研究聯盟主辦，11 月 20-21 日。

11 關於北港朝天宮修建沿革，可詳見《北港朝天宮建築與裝飾藝術》（李乾朗 1993：44-47）、《北港朝天宮志》（蔡相輝 1995：113-114）、蔡侑樺、徐明福，2012，〈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建築空間之變遷〉。《民俗曲藝》176：155-192。

12 關於北港朝天宮重建捐獻資料，可詳見謝名恆、羅烈師、邱彥翔，2025，〈北港朝天宮現存北臺灣客庄文物及史料概述〉。頁 720-746，收錄於臺灣媽祖文化研究協會編，《2024 北港進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港：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

隨後送至北港朝天宮（1914年間製匾）。假設日人杉山靖憲於大正5年（1916）撰寫《臺灣名勝舊蹟誌》時，書中所見未刻有御璽之「與天同功」匾額，正是由「新埔街信眾」所捐獻給北港朝天宮之「與天同功」，那便可推測此匾於大正5年（1916）前已經贈與朝天宮。尤其當時北港朝天宮剛完成整建（1912），來自新埔的信眾前往北港進香時，看見嶄新壯麗的媽祖廟宇，間接促成之後建成新埔與天宮（1914）。

若以新埔與天宮建成年代為（1914）核心進行推估，前兩年（1912）正巧是北港朝天宮修建落成，後兩年（1916）日人杉山靖憲調查出版《臺灣名勝舊蹟誌》。基於此，本文認為新埔街信眾之「與天同功」此匾，極有可能為大正元年（1912）至5年（1916）間製成贈與。然而無論何種假設，經由查證這塊匾額的捐贈者，吾人得以梳理出新埔與天宮和北港朝天宮始於日治初期的分香與交陪關係，而「新埔與天宮」之命名即與御匾之間密切相關。

進一步仔細觀察北港朝天宮內新發現的關鍵史料《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共有17頁，分別詳細記錄當時各殿的神像名稱及神尊數量，僅有部分備註擺放位置和捐獻人名。其中依序為「媽祖殿諸神像名稱」共36尊、「佛祖殿諸神像名稱」共32尊、「三界公殿神像名稱」共6尊、「五文昌殿神像名稱」共11尊、「聖父母殿神位像名」共10尊、「註生娘殿諸神像名稱」共2尊、「雙公殿諸神像名稱」共9尊、「由三穿至大殿之部備品」¹³共66項。

本件《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總計收錄172件殿內神尊、祭器、匾額、柱聯、燈具、時計、机棹、燭台、盒架等。其中「由三穿至大殿之部備品」，分別紀錄著「番號（編號）、品目、數量、品質、原價、備品年月日、處分年月日、摘要」等條目。筆者逐一詳閱，初步發現北港朝天宮內現存來自客家地區所捐獻之物件，其中北臺灣客家庄有關之物件，本文將詳列如下表內。因「原價、備品年月日、處分年月日」三個項目皆未紀錄，故本表格不列入；此外「備註」一欄為本文所加，特此說明文物現況（參見表2）。

13 「三穿」應是「三川」，然而本文保留《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中之用字。



圖 7 《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紅框處為新埔街信眾捐獻之「與天同功」匾額紀錄。
（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提供）

表 2 《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北臺灣客家文物一覽

編號	品目	數量	品質	摘要	備註
30	吊大時計			北埔庄彭南科贈	據傳日治時期遭竊遺失。
39	柱聯	一對	平面	新竹北埔姜義豐贈	1919年，現存於朝天宮文物館庫房內。
42	匾額	一		與天同功新埔街眾信	據本文推測 1912-1916年，現存於朝天宮內，懸掛於正殿龍邊過道上方橫樑。
54	四角机棹	三塊		新竹吳曾氏西外一人	尙待找尋。
60	置時計	一		中壢新屋眾信叩	據傳日治時期遭竊遺失。
61	薦盒架	一	□裂	新竹州下波羅汶張建蘭	1930年，現存於朝天宮文物館庫房內。
66	大案棹	一		新竹廳下沙坑何阿立外九人	1908年，現存於朝天宮內，正殿案桌。

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提供，本文彙整註記。

（二）簿中記載之北臺灣客家文物

透過上表可知，《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中，有兩件時鐘類型的捐獻物件為「吊大時計（北埔彭南科贈）」和「置時計（中壢新屋眾信叩）」，

筆者詢問邱彥翔研究員得知，應於日本時代遭竊，兩者皆遺失；至於「四角机棹（三塊，新竹吳曾氏西外一人）」，此物件應是三張四方形之小型案桌，尚待找尋是否保留至今。目前確認現存於宮內之物件有，簿中編號 39「柱聯（一對，新竹北埔姜義豐贈）」、簿中編號 42「匾額（與天同功 新埔街衆信）」、簿中編號 61「薦盒架（新竹州下波羅汶張建蘭）」、簿中編號 66「大案棹（新竹廳下沙坑何阿立外 9 人）」等 4 件。

此外，筆者另發現 3 件日治時期之文物未收錄於本簿中，卻同為北臺灣客庄捐獻物件，分別是「大正 3 年（1914）桃園廳三坑仔區內弟子敬獻文昌殿頂桌」「桃園廳三坑仔區庄內敬謝望燎爐座，推測同為大正 3 年（1914）」、「大正 9 年（1920）大茅埔聯庄敬獻柱聯」。以下段落首先討論此簿記載之「柱聯、薦盒架、大案棹」，另外說明未紀錄之「三坑文昌殿頂桌、三坑望燎爐座、大茅埔聯庄柱聯」，依序詳述如下：

編號 39「柱聯（一對，新竹北埔姜義豐贈）」，原先懸掛於聖母殿牆壁柱聯，現收存於北港朝天宮文物館內。此物件為大正 8 年（1919）由新竹北埔信士姜義豐奉獻，前生員彭裕謙敬題之柱聯一對。材質為銅片，外型是長條形掛聯，有掛鉤，蝕刻楷體圖紅字黑底，尺寸長 283 公分、寬 35 公分。本聯讚頌媽祖庇佑海上行船，都來瞻仰聖母慈藹之儀照耀海宇；媽祖孝敬事蹟，深受信眾虔誠供奉，聖德光耀湄洲故居（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 2010：143）。柱聯內文謄錄如下（參見圖 8）：

日期：己未年春月吉立

上聯：恩周萬里波濤舉棹往帆來共仰母儀光海國

下聯：想到一生孝敬知蘋香藻潔都緣聖德炳湄洲



圖 8 大正 8 年（1919）新竹北埔姜義豐贈之柱聯，正面照。（北港朝天宮提供、筆者拍攝）



落款：新竹北埔信士姜義豐奉獻 前生員彭裕謙敬題

透過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上）》指出「姜義豐是姜家所成立之公嘗，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姜殿邦、殿斌分家時即已編立。直至民國四年（1915）殿邦房子孫才再度分爨，嘗號仍然稱為姜義豐公嘗，抽出年五百石的土地（約十甲）充當祭祀公業，其土地收入年約四千元，以充當年中行事及祭祀費用（吳學明 2000：246）」。另根據《臺灣省新竹縣志》〈卷九人物志〉中記述「彭裕謙原籍廣東省潮州；先代彭德山，嘉慶中度臺，初居鹽菜棚；子彭官生謙中港，生裕謙，後移北埔。……及臺灣改隸後，於民國前十三年即明治三十二年二月，以秀才資格，受配紳章；並受命編纂北埔志。翌年就職北埔公學校囑託，教授漢文（黃旺成主修、郭輝等纂 1976〔1957〕：40-41）」。

編號 61「薦盒架（新竹州下波羅汶張建蘭）」，原先放置於觀音殿，現收存於北港朝天宮文物館內。此物件為昭和 5 年（1930）正月時由新竹州新竹郡湖口庄波羅汶中崙信士張建蘭、張門溫氏共同奉獻。根據昭和 14 年（1939）《全島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一覽表》（臺灣新民報社 1939：6）中記載，張建蘭為新竹州協議會員，是新竹郡紅毛庄之官選代表。薦盒架即是敬茶几，材質為木質，尺寸尚待確認，兩側寫有捐獻人名與時間謄錄如下（參見圖 9）：

左側：新竹州新竹郡湖口庄□（波）羅汶中崙居住（信士）張建蘭、張門



圖 9 薦盒架。（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提供）



圖 10 沙坑庄大案棹左側桌腳落款捐獻人名。（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提供）

溫氏仝誠心叩謝

右側：昭和五年庚午歲孟春吉日

編號 66「大案棹（新竹廳下沙坑何阿立外九人）」，現今放置於北港朝天宮大殿正前方。此物件為明治 41 年（1908）由新竹廳竹北一堡沙坑庄弟子鍾英華等人所捐獻。需要說明的是，本桌至今仍在使用的，因此無法拍攝完整物件全貌，僅有局部紅外線照以利辨識捐獻人名（參見圖 10）。大案棹的左側桌腳處落款時間為「歲次戊申年」，然而 1908 年正是縱貫鐵路全島通車之時。沙坑庄現為新竹縣橫山鄉沙坑村，以鍾英華為首，另有 10 位庄民信眾捐贈名單如下：

廖未秀、陳阿泉、羅慶善、黃顯榮、戴龍秀
 巫阿立、鍾阿祿、廖進春、鍾德鴻、陳阿貴
 仝叩

鍾英華為興建沙坑三元宮之地方仕紳，沙坑三元宮位於新竹縣橫山鄉中豐路三段 243 號，為橫山鄉沙坑村、福興村、力行村與關西鎮南新里、新富里之信仰中心。根據廟方記載：「三元宮舊址原稱為崩崁，後因廟宇破舊不堪，且地理位置欠佳，實傳險訊不測等，遂於大正 5 年（1916）民國五年，由地方紳士鍾英華等倡議遷建廟宇（現在廟址），當時由鄒仕元捐獻廟地，地理座北朝南。」¹⁴此外大案棹的左側桌腳處另有落款時間為「孟夏吉日置」，推測為 1908 年的農曆四月所獻，同時有 10 位信眾落款，姓名如下：

何阿立、吳阿養、湯阿尚、傅阿錦、鄧阿德
 張德宗、彭阿壽、張安生、湯阿勝、徐帝恩
 仝敬叩

以上 3 件現存於北港朝天宮內之客庄文物「柱聯（一對，新竹北埔姜義豐贈）」、「薦盒架（新竹州下波羅汶張建蘭）」、「大案棹（新竹廳下沙坑何阿立外九人）」，連同「匾額（與天同功 新埔街眾信）」皆收錄於《昭和六年北港

14 新竹縣橫山鄉數位機會中心，三元宮歷史變遷，資料來源：https://itaiwan.moe.gov.tw/doc/local_info.php?doc=294&id=370。檢索日期：2025 年 11 月 24 日。



圖 11 文昌殿頂桌腳落款人名下半部分之一。
(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提供)



圖 12 桃園廳三坑仔區內敬謝望燎爐座。
(資料來源：北港朝天宮提供)

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之中。由上可見，日治時期的北臺灣客家庄，如新竹北埔、湖口、橫山、新埔等地的重要家族與地方仕紳，都有向朝天宮捐贈物件。簡言之，北臺灣客庄與北港朝天宮有著相當程度之跨區交陪及互動關係。

(三) 簿中未記載之北臺灣客家文物

除此之外，根據本文實地考察更是發現《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中，未有記載之客庄文物另有 3 件：「大正 3 年（1914）桃園廳三坑仔區內弟子敬獻文昌殿頂桌」「桃園廳三坑仔庄內敬謝望燎爐座，推測同為大正 3 年（1914）」、「大正 9 年（1920）大茅埔聯庄敬獻柱聯」，以下分別詳述。

首先是「大正 3 年（1914）桃園廳三坑仔區內弟子敬獻文昌殿頂桌」，現今放置於北港朝天宮文昌殿正前方。此物件為大正 3 年（1914）由桃園廳三坑仔區內弟子所捐獻。同樣需要說明的是，本桌至今仍在使用的，因此無法拍攝完整物件全貌，僅有局部紅外線照以利辨識捐獻人名（參見圖 11）。三坑仔區現為桃園市龍潭區三坑里，此桌以李蓋發、李火來、李蓋全、李蓋忠等人為首，共有 57 位庄民信眾捐贈名單如下：

桃園廳三坑仔區內弟子

李蓋發、李火來、李蓋泉、李蓋忠

李天送、李接登、李蓋林、馮葆

鄒禮壽、陸昌義、李接和、廖來

李蓋棠、李茶順、江門呂氏、鄧乞食
 李蓋盛、陸鼎發、古仁富、李蓋枝
 盧□□、古盛火、邱雲煥、李蓋昌
 □□□、曾萬保、賴達金、江文田
 林金元、李蓋洪、許時清、鍾連振
 李阿林、張金城、鍾連貴、李蓋石
 張金祿、賴昂、徐桂、李蓋雲
 鍾石、梁糲、邱滿、廖德、楊石
 張氏香、鄧氏美、盧氏位、鍾氏香
 張氏銀、鄧氏冬、曾氏菊、張氏勤
 葉李氏接、楊江氏金蘭、張氏月、葉黃氏妹仝叩謝

查閱明治 34 年（1901）《職員錄甲》（臺灣總督府 1901：824）中記載李蓋發為「大嵵崁辨務署第十一區街庄長」。另外依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得知，李蓋發擔任過桃仔園十一份庄長（臺灣日日新報 1899）、桃仔園廳第二十四區長（臺灣日日新報 1903）、桃仔園廳農會會員（臺灣日日新報 1904）、大溪郡協議會員（臺灣日日新報 1921）。至於李火來則是龍潭庄官選協議會員（臺灣日日新報 1935）、大溪郡米穀統治組合第二區總代（臺灣日日新報 1937）。¹⁵ 另外李蓋泉根據明治 31 年（1898）《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中紀錄為桃仔園辨務署桃澗堡第二十八區庄長（臺灣總督府 1898：42）。

綜上所述，三坑仔李家之中有多位擔任日治時期的地方要職，屬於當地重要家族。此外另有「桃園廳三坑仔庄內敬謝望燎爐座」，推測同為大正 3 年（1914），原先僅於廟會活動時擺放，現收存於北港朝天宮文物館庫房內。應同樣屬於三坑仔庄內李氏家族為首捐獻之物件，可視為與文昌殿頂桌同時期物品（參見圖 12）。

15 遠猷白雉，明治 32 年（1899）6 月 22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340 號）。博覽會觀光論，明治 36 年（1903）6 月 23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542 號）。擬設防風林，明治 37 年（1904）9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909 號）。大溪近訊／公校落成，大正 10 年（1921）5 月 28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7536 號）。昭和 10 年（1935）11 月 12 日，龍潭／官選內示，《臺灣日日新報》（第 12795 號）。昭和 2 年（1937）2 月 18 日，龍潭／米統總代，《臺灣日日新報》（第 13255 號）。



最後則是「大正 9 年（1920）大茅埔聯庄敬獻柱聯」，原先懸掛於聖父母殿神龕前金柱掛聯。根據北港朝天宮廟方表示，已不幸於 1995 年聖父母殿的火災中燒毀，故此物件僅留存照片。所幸仍可見於廟方文獻之中，翻閱《北港朝天宮：文物專輯壹》（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 2010：126）記述，其材質為木板，外形是半圓型長條木板陰刻鐫楷書黑底塗以金漆，尺寸長 210.5 公分、寬 34.5 公分。本柱聯內文如下（參見圖 13）：

日期：大正庚申年恭請聖母北巡為積慶衍澤公偕夫人紀念

上聯：積厚必流光衍派長林遺聖母

下聯：慶餘遺顯達澤承大宋仰神宗

落款：新竹州新埔大茅埔聯庄代表楊成水、林孔昭、吳明相全拜撰

其中「大茅埔聯庄」是「新竹新埔枋寮褒忠義民廟十五大聯庄」之一的祭祀組織名稱，總爐主家族公號「吳廖三和」。輪值年度「1996、2011、2026」，現今所轄地區「新埔鎮：巨埔、鹿鳴、新北、照門、清水里；龍潭區：三水、三和里；關西鎮：東平（16-18 鄰）」。

值得注意的是，楊成水、吳明相兩人皆為光緒 2 年（1876）時任大茅埔三元宮改建委員會之地方仕紳，其中吳明相後擔任日治時期新埔庄之保正（臺灣日日新報 1926）。¹⁶此外林孔昭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紀錄中於明治 31 年（1898）從事臺北縣新埔辦務署雇員（臺灣總督府 1898：47）；之後在明治 38 年（1905）擔任新竹廳第十



圖 13 大正 9 年（1920）新埔大茅埔聯庄敬獻之對聯。（北港朝天宮拍攝提供（僅留存相片，實物已燒毀））

16 新埔紀念碑 除幕式，大正 15 年（1926）11 月 4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9522 號）。

四區街庄長（臺灣總督府 1905：644）；¹⁷ 並且從明治 43 年（1910）至大正 9 年（1920）年間，連任新竹廳大茅埔區區長總共十年（臺灣總督府 1910：258）。¹⁸ 另於大正 2 年（1913）開始負責新埔林氏家廟經理，處理申請及籌建祠堂事宜（臺灣日日新報 1917）。¹⁹

以上三件來自客庄的捐獻文物雖未收錄於《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中，然而經過本文初步的調查盤點結合史料彙整，可以發現與原先紀錄簿內的四件客庄文物高度相似，皆為由北臺客庄信徒所捐獻之案棹、祭器與柱聯。並且多是地方重要仕紳與家族所共同敬獻，顯示出客庄與北港之間的密切關聯。

四、結語

本研究利用北港朝天宮內文物與檔案，重新考察媽祖信仰與客家地區的互動關係。藉由再次爬梳既有文獻，誠如《臺灣名勝舊蹟誌》（杉山靖憲 1916）、《北港朝天宮簡介》（朝天宮管理委員會編 1967）、《北港朝天宮志》（廖漢臣審定 1968）、《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鄭喜夫、莊世宗 1988）、《北港朝天宮志》（蔡相輝 1995）、《北港朝天宮：文物專輯壹》（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 2010）中關於「與天同功」匾額之文字與影像紀錄；結合新發現之關鍵史料《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所記載「與天同功 新埔街眾信」條目；又進一步搭配田野調查來考釋此匾的贈與來源、捐獻時間、形式差異及其工藝特色，證實了新埔與天宮贈北港朝天宮「與天同功」匾額來歷。此外，本匾所呈現新埔街客庄與北港朝天宮之深厚關係，值得另文推敲（羅烈師、謝名恒、王鈺涵 2025）。

更重要的是，本文釐清北港朝天宮自 1908 年至 1912 年廟宇重修期間，正是與新埔街信眾前往北港進香及分香時期高度重疊（1911-1914），並且新埔與天宮之興建（1914）密切相關。本研究利用日人杉山靖憲調查出版《臺灣名勝舊蹟誌》（1916）作為基準，明確推論「與天同功」匾額，極有可能為大正元年（1912）

17 臺灣總督府，1905，《職員錄甲》。頁 644。

18 臺灣總督府，1910，《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頁 258。

19 新埔林姓宗祠落成，大正 6 年（1917）10 月 12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6212 號）。



至 5 年（1916）間製成贈與北港朝天宮。同時考證北港朝天宮大殿增高工程期間（1963-1972），說明為何早期的兩本《北港朝天宮簡介》（朝天宮管理委員會編 1967）、《北港朝天宮志》（廖漢臣審定 1968）中，「與天同功」匾額因正殿整修另外保存，因而未記載於書中。更是提出《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鄭喜夫、莊世宗 1988）中將北港朝天宮內之「與天同功」匾「誤植為御匾」，進一步導致後期兩本《北港朝天宮志》（蔡相輝 1995）、《北港朝天宮：文物專輯壹》（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 2010）將其「誤認為御匾」。正是呼應李建緯強調廟方藉由再製或仿製的御匾，刻意營造靈驗故事、形塑群體認同，正是屬於「建構出來的集體記憶」此一觀點（李建緯 2014）。

除此之外，藉由本文發現《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中，目前確認現存於宮內之物件有編號 39「柱聯（一對，新竹北埔姜義豐贈）」、編號 42「匾額（與天同功 新埔街衆信）」、編號 61「薦盒架（新竹州下波羅汶張建蘭）」、編號 66「大案棹（新竹廳下沙坑何阿立外九人）」等四件。與此同時，筆者另發現三件日治時期之文物未收錄於本簿中，卻同為北臺灣客庄捐獻物件，分別是「大正 3 年（1914）桃園廳三坑仔區內弟子敬獻文昌殿頂桌」、「桃園廳三坑區仔庄內敬謝望燎爐座，推測同為大正 3 年（1914）」、「大正 9 年（1920）大茅埔聯庄敬獻柱聯」。以上現存於北港朝天宮內的北臺灣客庄文物，明確顯示出客家仕紳與北港之間的跨區交陪。換言之，朝天宮內的衆多文物史料，也值得據以持續探索客庄媽祖信仰的淵源與發展。

參考文獻

- 北港朝天宮，1931，《昭和六年北港朝天宮各殿明細一覽簿》。雲林：北港朝天宮。
- 吳學明，2000，《金廣福墾隘研究（上）》。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 杉山靖憲，1916，《臺灣名勝舊蹟誌》。臺北：臺灣總督府。
- 李建緯，2013，〈臺灣媽祖廟所見「與天同功」匾形式與工藝研究〉。頁 309-335，收錄於葉樹嫻總編輯，《2013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 李建緯，2014，〈臺灣媽祖廟現存「御匾」研究：兼論其所反映的集體記憶與政治神話〉。《民俗曲藝》186：103-179。
- 李建緯，2018，《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臺中：豐饒文化社。
- 李乾朗，1993，《北港朝天宮建築與裝飾藝術》。雲林：北港朝天宮。
- 林文龍、李西勳、吳政恆，2010，《北港朝天宮：文物專輯壹》。雲林：北港朝天宮。
- 朝天宮管理委員會編，1967，《北港朝天宮簡介》。雲林：朝天宮管理委員會。
- 黃旺成主修、郭輝等纂，1976〔1957〕，《臺灣省新竹縣志》卷九人物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 廖漢臣審訂，1968，《北港朝天宮志》。雲林：朝天宮管理委員會。
- 臺灣新民報社，1939，《全島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一覽表》。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 臺灣總督府，1898，《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
- 臺灣總督府，1901，《職員錄甲》。臺北：臺灣總督府。
- 臺灣總督府，1905，《職員錄甲》。臺北：臺灣總督府。
- 臺灣總督府，1910，《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
- 蔡侑樺、徐明福，2012，〈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建築空間之變遷〉。《民俗曲藝》176：155-192。
- 蔡相輝，1995，《北港朝天宮志》。雲林：北港朝天宮。
- 鄭喜夫、莊世宗，1988，《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謝名恒、羅烈師、邱彥翔，2025，〈北港朝天宮現存北臺灣客庄文物及史料概述〉。頁 720-746，收錄於臺灣媽祖文化研究協會編，《2024 北港進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港：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
- 羅烈師、謝名恒、王鈺涵，2025，〈新埔與天宮媽祖信仰之形成〉。論文發表於「2025 第三屆全球客家研究聯盟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新竹縣竹北市：全球客家研究聯盟主辦，11月20-21日。